

哲学翻译何以可能:《金花的秘密》中的 语言哲学意蕴

姜 颖

(山东大学 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金花的秘密》是近代西方极具影响力的中国哲学译著之一,也是中西思想交流史上的经典个案。哲学翻译不仅涉及语言转换,更关系到不同思想体系之间的理解、诠释与重构。以语言哲学的单子论、普遍论为视角,可重新审视《金花的秘密》的译介实践,深入厘清哲学翻译的内在困境与可行的实现路径。单子论揭示了不同语言背后世界图景和思维方式的差异,使原典的文化负载词、哲学观念及翻译目的始终处于不可通约的张力之中;而普遍论则说明不同文明之间仍然存在思想沟通的可能,其实现有赖于译者深入原典思想传统、保持文化负载词的功能对等,并以开放包容、超越文化本位的态度重构概念体系。《金花的秘密》的译介实践表明,哲学翻译并非追求词语意义的机械对应,而是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实现思想结构与哲学功能的创造性转换,它为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和跨文明思想对话提供了具有启示意义的范例。

关键词:《金花的秘密》;卫礼贤;贝恩斯;哲学翻译;单子论;普遍论

中图分类号:B95;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82(2026)05-0093-10

纵使时代对跨文化交流不断提出更高要求,哲学翻译^①在哲学研究中仍然偏居一隅、颇受低估。^②事实上,“哲学所体现的解释和创造都位于语言的中枢。当翻译接触到这样一个重要文本时,它也就与此相连了”^③。

在欧洲学术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汉学译著《金花的秘密》,是哲学文本翻译的典范,搭建起中西哲学对话的桥梁。卫礼贤(Richard Wilhelm)首先将《太乙金华宗旨》翻译成德文,题名《金花的秘密——中国的生命之书》(Das Geheimnis der goldenen Blüte. Ein chinesisches Lebensbuch),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为之作序言和评注,该书于1929年在德国出版。1931年,贝恩斯(Cary Baynes)在荣格夫妇的指导下,将卫礼贤译本转译为英文,开启了西方学界译介、研究该书的热潮。在翻译和评注的过程中,卫礼贤、荣格和贝恩斯都作出了创造性理解和阐释,这体现了保罗·利科提出的“翻译即诠释”的核心观点^④,是哲学翻译促进思想文化交流的生动例证。然而,当前学界主

收稿日期:2026-01-24

作者简介:姜颖(1979—),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易学。

① 哲学翻译是指对哲学文本的跨语言转写,具有独立的研究价值。历来的翻译理论几乎都认为一般材料翻译和哲学文本转写迥乎不同。如德国古典语言学家施莱尔马赫把一般翻译称为Dolmetschen,而将哲学文本的创造性转写称为Übersetzen。

② 参见潘大为《“克己”与“克性”:中西对话、语言多样性与哲学翻译》,载《哲学研究》2021年第10期,第55—65页。

③ [美]乔治·斯坦纳著,孟醒译《巴别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57页。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书名简称“《巴别塔之后》”与页码。

④ 参见武光军《翻译即诠释——论保罗·利科的翻译哲学》,载《中国翻译》2008年第3期,第16—19页。

要聚焦于《金花的秘密》的心理哲学意蕴^①,仅见宓田关注到该书的西班牙语再译本传播问题^②,尚未有从哲学翻译角度展开的专题考察,这对《金花的秘密》研究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以卫礼贤等人的翻译实践为样本进行考察,有助于厘清中国哲学文献外译过程中思想会通的范式。

一、《金花的秘密》翻译的背景与理论

卫礼贤“一生翻译了十一部中国古代经典,《太乙金华宗旨》是其中唯一一部道教经书”^③。在中国思想史上,《太乙金华宗旨》绝非一本大书,“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卫礼贤的译本在西方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才使得它在中国学界重新获得了关注”^④。与早期“道经尚未进入西方人的视野”^⑤之境遇大相径庭,卫礼贤译本使《太乙金华宗旨》声名鹊起,而随着贝恩斯等人的争相转译,“西方引起了对于该书该如何理解、如何翻译的学术争鸣”^⑥。

由此,探究卫礼贤等人选择《太乙金华宗旨》作为译介对象的思想动因,分析《金花的秘密》何以引发西方学界广泛的关注与争鸣,并依托哲学翻译理论重审译介实践,是考察哲学文本在跨文化认知与沟通中的作用的必要前提。

《太乙金华宗旨》是一部以“光”为核心的道教内丹典籍,较之《周易》《论语》等传世经典,曾有问津者寥若晨星。据卫礼贤所述,该书原本流传于中国的一个秘传圈子,长期依靠口耳相传,后来才形诸文字,仅在少数被认为能够领会其义理的人中间流布。^⑦该书确切的成书年代尚不可考,大抵在康熙年间。据莫妮卡·埃斯珀斯托(Monica Esposito)的考证,《太乙金华宗旨》主流传世版本有六种。^⑧卫一贝系统《金花的秘密》据以译评的底本当为20世纪初湛然慧真子整理刊行的净明派《长生术续命方合刊》,卫礼贤曾自述访书经历:“1920年在北平与《慧命经》合刊重印了一千本……我得到了其中一本。”(《金花的秘密》,第75页)

除拥有刊本之便外,卫礼贤译介《太乙金华宗旨》主要还出于以下考量。首先,卫礼贤一直保有向欧洲世界介绍中国宗教的愿景。早在1910年,卫礼贤便与迪得里希出版社共同策划“中国宗教与哲学”丛书,希望打造一套经典译著,以期向德国读者呈现中国文明的整体面貌。^⑨从其最初拟定的书目来看,唯独中国宗教的部分始终悬而未决,迟迟未能付梓。直到卫礼贤译成这部被其视作中国

① 参见李夏菲《从“回光”到集体无意识——卫礼贤译〈太乙金华宗旨〉及相关问题思考》,载《世界宗教文化》2020年第1期,第111—119页。

② 参见宓田《“金花的秘密”——〈太乙金华宗旨〉在西班牙语世界的译介》,载《中国文化研究》2025年第3期,第158—166页。

③ 李夏菲《从“回光”到集体无意识——卫礼贤译〈太乙金华宗旨〉及相关问题思考》,载《世界宗教文化》2020年第1期,第111页。

④ 李夏菲《从“回光”到集体无意识——卫礼贤译〈太乙金华宗旨〉及相关问题思考》,载《世界宗教文化》2020年第1期,第112页。

⑤ 俞森林《道经英译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第5页。

⑥ 宓田《“金花的秘密”——〈太乙金华宗旨〉在西班牙语世界的译介》,载《中国文化研究》2025年第3期,第158页。

⑦ 参见[瑞士]荣格、[德]卫礼贤著,张卜天译《金花的秘密:中国的生命之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75页。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书名简称“《金花的秘密》”与页码。

⑧ 参见Mori Yuria, ‘Identity and Lineage The *Taiyi jinhua zongzhi* and the Spirit-Writing Cult to Patriarch Lü in Qing China’, in Livia Kohn and Harold D. Roth, *Daoist Identity: History, Lineage and Ritual*,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7, pp.165—166.

⑨ 参见Ulf Diederichs, *Eugen Diederichs und sein Verlag: Bibliographie und Buchgeschichte 1896 bis 1931*, Göttingen: Wallstein Verlag, 2014, p.124.

道教和秘密教派的重要经典,其搁置多年的计划才得以实现。就此而言,《金花的秘密》实现了卫礼贤长期以来向西方呈现中国宗教精神世界的夙愿。

其次,卫礼贤认为《太乙金华宗旨》不仅是道教修炼的指南,更保存了道家思想的精神内核。该书发掘了曾被炼丹、服食遮蔽的更深层的哲学意蕴,将修炼重心转向人的生命真性,倡导通过“回光”“守中”“炼神”等工夫趋近“性命双修”的境界。在卫礼贤看来,这种由外向内的转变,实际上意味着对道家思想本旨的重新回归,因其“重新接近了老子原本的思想”(《金花的秘密》,第78页),而具有向西方展示中国哲学精神的独特价值。

此外,《太乙金华宗旨》呈现出思想的综合性,蕴含着开展跨文明思想对话的潜质。该书虽以内丹学为旨归,却大量吸纳儒、释之说,呈现出三教会通的鲜明特征。卫礼贤认为《太乙金华宗旨》堪称思想结合的成功范本:该书虽是道教典籍,却杂糅了否定尘世、以涅槃为终极关怀的纯粹佛教思想,同时与儒家思想存在广泛的共同基础。(参见《金花的秘密》,第78—79页)这意味着该书在包容性上不乏独到之处,他甚至声称“许多欧洲读者也许会明显感到,书中的许多说法都与基督教教义有相似之处”(《金花的秘密》,第79页),着力彰显该书的思想对话潜质。

出于个人志趣、原书价值以及其中蕴藏的文明互鉴可能性,卫礼贤译成了《金花的秘密》一书。此后,贝恩斯在卫礼贤德译本的基础上完成英译,并将其正式介绍给英语世界。无论《易经》还是《金花的秘密》,“在西方世界之所以有如此大影响,贝恩斯夫人译笔的贴切(Felicity)也是一个主要原因”^①。在卫礼贤本人及贝恩斯影响力的推动之下,这一系列翻译活动获得了西方思想界的广泛关注。

然而,学界对《金花的秘密》译本的评价并非全然褒扬。以克利里为代表的译家坚持认为卫礼贤—贝恩斯译本系统不仅存在删节、误译等语言问题,而且在概念结构上受到了荣格心理学的深刻影响,以至于《太乙金华宗旨》的原有思想面貌在相当程度上已遭到改易。^②这类对卫礼贤和贝恩斯翻译可靠性的质疑,折射出《金花的秘密》的翻译并非语法和词汇的对应游戏,而是哲学翻译的先驱和典范;同时也提示出,归化式的翻译策略本身潜藏着以目的语概念体系僭越原典思想的风险,下文在讨论具体翻译策略时将对此作进一步辨析。恰似芬兰译家蒂纳·阿尔佩(Tiina Arppe)在《哲学翻译论》(De la traduction de la philosophie)中所指出的那样,哲学翻译本质上是一种哲学活动,翻译家必须基于自己对哲学问题的理解完成翻译。^③

哲学翻译有坚实的理论依托,例如,以斯坦纳阐释学为代表的译学理论主要聚焦于“翻译是否可能”的问题。^④“语言哲学中有两种大相径庭的看法。其中之一认为语言的深层结构是普遍的,适用于所有人。人类语言的差异本质上是表面现象。翻译完全是可以实现的……相反的观点可被称为‘单子论’(monadist)。它认为普遍的深层结构或是对逻辑和心理研究来说深不可测,或是一种因过于抽象和普遍而沦为冗谈的规律。”(《巴别塔之后》,第80页)这二者的争论是翻译理论的重要问题,普遍论的典型代表是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单子论的代表理论是“萨丕尔—沃尔夫假说”。^⑤事实上,极端固守单一立场的学者早已为数不多,许多译家“对‘普遍论’和‘单子论’采取了

① 李新烽、白乐主编《译路帆远:汉学家谈翻译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第95页。

② Thomas Cleary, *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 The Classic Chinese Book of Life*, New York: HarperOne, 1991, p.3.

③ 参见Tiina Arppe, *De la traduction de la philosophie*, in *Traduire*, 2012(227), p.34.

④ 参见傅莉《翻译是否可能:斯坦纳阐释学译学思想的进路》,载《汉字文化》2025年第3期,第178—180页。

⑤ 参见易翔、刘军平《妙极语言之机神 思合翻译之符契——再论〈巴别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载《中国翻译》2022年第2期,第84页。

‘执两用中’的辩证态度”^①,在不少译著中,二者的“线索也同时存在”(《巴别塔之后》,第81—82页)。其中,单子论强调不同语言系统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别,因之各自负载的哲学和世界观也大相径庭,很难通过翻译完全表达,代表着对不同文明语言和思想独特性的肯认;普遍论则捍卫翻译的可能性,彰显译者为跨文化交流、中西哲学会通付出的不懈探索。卫一贝系统《金花的秘密》无疑体现了哲学翻译层面单子论与普遍论的调和,恰似卫礼贤所说:“在这些思想中,有一部分裹着陌生的外衣而显得很古怪,而另一部分则获得了一种显著的新活力。这里我们又看到了那个一再被证明的观点:‘东方和西方,不会再各自一方。’”(《金花的秘密》,第81页)需要说明的是,斯坦纳虽以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作为普遍论的典型代表,但他同时提醒,“深层结构普遍”这一语言学命题并不能直接担保翻译的可行性。乔姆斯基本人即明确指出,根深蒂固的形式普遍现象的存在,虽然意味着所有语言在相当程度上出自相同的模式,但“并不暗示语言间的翻译必定有某种合理的程序”,斯坦纳将此称为乔姆斯基论述中“一次关键的割裂或转变”。(《巴别塔之后》,第111页)在斯坦纳看来,普遍论更为切实的支点是一个经验事实:“人类思维确实跨越语言障碍进行交流。”(《巴别塔之后》,第99页)而翻译实践正是检验语言之普遍性与特殊性如何两全的试金石(参见《巴别塔之后》,第111页)。这也与斯坦纳“理解即翻译”的阐释学论旨一脉相承:翻译的可能性并非由语言深层结构的普遍性预先担保,而要在译者具体的理解与诠释活动中获得兑现。对《金花的秘密》翻译策略的考察,也可以循此思路展开。

二、单子论与《金花的秘密》翻译的难点

荣格在概述卫礼贤《金花的秘密》翻译的价值时强调:“西方的意识绝非普遍意识,而是有着历史地理因素的限制,它只代表人类的一部分。”(《金花的秘密》,第62页)可见,语言及其所反映的认知所存在的中西差异,是哲学翻译的必要前见和攻关重点。单子论语言学家沃尔夫认为不同的语言是不同民族观念的反映和体现:“使用明显不同语法的人,会因其使用的语法不同而有不同的观察行为,对相似的外在观察行为也会有不同的评价;因此,作为观察者他们是不对等的,也势必会产生在某种程度上不同的世界观。”^②如果“语言本质上是以相互抵触的方式映射现实的单子”(《巴别塔之后》,第99页),那么跨语言交流和翻译必然是充满障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太乙金华宗旨》的外译,不单单是汉语与德语、英语的转换,更是两套世界观的交锋。这意味着卫礼贤等人的《金花的秘密》的译介实践面临诸多困境。

首先是术语的模糊和对应困难。“翻译中的语义对应,即为隶属于此传统的哲学术语寻求在彼传统中的、精细至语素(morpheme)即最小语义单位的对应。”^③令人倍感棘手的是,《太乙金华宗旨》原文中存在大量独有的术语,在德语和英语中很难找到意义相近的概念。荣格在评议卫礼贤的翻译时就突出了这一困境:

西方思想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它根本没有“道”的概念。“道”这个字由“首”和“走”这两个字所组成。卫礼贤把“道”译成 Sinn(意义),还有人将其译为 Weg(道路)、Providence(天恩),耶稣

^① 易翔、刘军平《妙极语言之机神 思合翻译之符契——再论〈巴别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载《中国翻译》2022年第2期,第85页。

^② [美]本杰明·李·沃尔夫著,高一虹等译《论语言、思维和现实:沃尔夫文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20—221页。

^③ 潘大为《“克己”与“克性”:中西对话、语言多样性与哲学翻译》,载《哲学研究》2021年第10期,第56页。

会士甚至将其译为 Gott(神),由此可见翻译的困难。“首”可以理解为意识,“走”可以理解为“走路”,于是“道”这个概念就是:“有意识地走”或“自觉的道路”。(《金花的秘密》,第29页)

荣格的总结揭示了《金花的秘密》翻译中的文化转换障碍。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核心范畴并非单纯的词汇单位,而是承载着特定宇宙观、工夫论的意义结构。“道”在中国思想传统中有着复杂的义项,不能简单翻译为道路、原则或神圣意志,其意义是在长期哲学实践中形成的。无论是卫礼贤将其译为 Sinn(意义)的做法,还是荣格、贝恩斯和其他译家的理解,虽然已经尽可能贴近原义,实际上都未能摆脱以偏概全之嫌。由此可见,哲学翻译中很难发掘两个语言系统之间的直接语词对应,必须在异质思想传统之间不断协商意义边界。《金花的秘密》的翻译实践正是在这种张力中展开的,它无法完全摆脱西方概念体系对东方思想的重构,因而在意义转化时屡屡碰壁。

其次是观念的冲突。相较于术语层面的对应困难,更深层的障碍在于中西哲学赖以成立的立场并不一致,《金花的秘密》的评议者也曾坦言,纯然理智的、外在的视角难以把握东方思想对西方读者可能具有的实际意义,理智至多只会将这些思想视为哲学或民族学层面的猎奇对象。(参见《金花的秘密》,第19—20页)西方近代理性主义传统倾向于以主体与客体相分离的方式理解世界,将知识视为对外部对象的客观认识,而《太乙金华宗旨》所体现的道家修炼思想则强调主体自身的工夫实践和生命体验,真理并不来源于逻辑论证,而要在修持过程中获得验证。因此,《金花的秘密》的翻译不仅要面对语言转换,更要面对理解范式的转换。

这种认识世界方式的巨大差异,难免引发翻译者的抗拒。这种抗拒也不难理解:以所谓“科学理解”的外衣遮蔽心灵的真实参与,一方面源于学者不愿显露生动投入的矜持心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担心对异域精神的情感投入会演变为更深切的生命体验;而标榜“客观”的立场,往往使这部经典沦为汉学家施展语文学考据技巧的场域,反倒排斥了其他可能的诠释路径。(参见《金花的秘密》,第15页)这种自我本位的理解虽然能够为西方读者提供进入文本的途径,却仍然属于外在的理解,其本质是将东方思想客体化为研究对象,而非将其作为一种能够改变主体生命经验的思想传统加以接受。所谓“科学理解”,实际上体现的是近代西方知识生产对于客观性和中立性的追求,它要求研究者保持与研究对象的距离,以避免价值介入。然而,《太乙金华宗旨》所讨论的内丹修炼、返照观心等内容,本身便以亲身实践甚至是坚定信仰为理解前提,若仅停留于语文学考据或民族学描述,则难以触及思想的真正旨趣。

可以说,哲学翻译受文化差异的影响尤为深重,对哲学文本而言,“翻译已不再仅仅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一种文化转换的模式”的观点已然成为学界共识。各自独立的术语和差异悬殊的价值取向,也给确定翻译目的带来了困难。从目的论的视角看,“翻译中对文化因素的处理一般可分为两种方法:主要以源语文化为归宿和主要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①,前者即“异化”(alienation),后者则被称为“归化”(adaptation)。《金花的秘密》的翻译始终面对“异化”与“归化”两难的境地。

在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看来,“异化”和“归化”是两条互斥的翻译路径,要么以原作为中心,引导读者接近作者;要么以读者为中心,使作者接近读者,二者不可折中杂糅。^②然而,针对《太乙金华宗旨》这类典籍,单纯采取任何一种路径都难以达到理想效果。倘若译者任由东西方思想在自己内心展开一场毫不妥协的生硬较量,便难以完成呈现中国真实图景的

① 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载《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第12页。

② 参见 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ng Literature: The German Tradition from Luther to Rosenzweig*, Amsterdam: Van Gorcum Assent, 1977, p.74.

使命。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搁置欧洲精神的既有预设,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参见《金花的秘密》,第13页)可如果只坚持“异化”,固然能够较大幅度地保存原典的思想特质,却容易因大量陌生概念和独特表达超出西方读者的既有知识结构而影响理解。若翻译者偏向“归化”,则虽有利于读者接受,却不可避免地会借助西方哲学、宗教乃至心理学范畴重构原作,使文本原有的思想脉络发生偏移,翻译的可靠性就会备受质疑。正如单子论所揭示的,不同语言对应着不同的认知方式和世界图景,译者无论选择“异化”还是“归化”,都难以完全摆脱文化差异的制约。客观地说,卫礼贤、贝恩斯等人的翻译虽然尽可能在忠实原典与促进理解之间不断寻求动态平衡,但仍有不少未尽之处。克利里就曾批评卫礼贤将“至虚至灵之神”译为“至高虚空与生命之神”的做法。原文中的“神”主要指虚明灵妙、感应无碍的心灵作用,并非基督教意义上的人格神;卫礼贤却受自身宗教背景影响,将其纳入神圣或超自然的范畴。这种归化处理虽然借助西方读者熟悉的神学语言降低了理解门槛,却改变了原文的心性论内涵。由此可见,过度归化不仅可能使原典服从译者既有的思想框架,还会在后续阐释中不断放大最初的偏差,使西方读者所接触到的与其说是中国道教思想本身,不如说是经过西方神学与心理学连续重构后的东方形象。^①

总的来看,当一种高度文化负载的思想文本被置于不同的语境中,译者既不可能使所有差异彻底抹平,也不能让原典对读者而言彻底陌生。《金花的秘密》激发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并不表明其翻译是失败的,它恰恰证明了哲学翻译本身就是理解和误解、接近和偏离之间的重新协商。单子论所揭示的语言差异、思想隔阂和翻译目的游移,展现出《金花的秘密》翻译实践的不易。而承认语言和文化存在一定的不可通约性,能够迫使译家反复打磨跨文化交际的策略。

三、普遍论与《金花的秘密》翻译的策略

如果说单子论强调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存在难以消弭的鸿沟,那么普遍论则试图回答另一个更具建设性的问题:翻译如何可能?按照普遍论的看法,“语言的深层结构是普遍的,适用于所有人。人类语言的差异本质上是表面现象”(《巴别塔之后》,第80页)。不过这一语言学命题本身并不能直接推出可行的翻译程序,普遍论对哲学翻译更为切实的支撑是思想能够跨语言交流的经验事实,而翻译正是这种跨越得以发生的基本方式。因而翻译的可能性不是先天既定的结论,而是有待译者在理解与诠释中实现的任务。哲学翻译不同于一般文本的语言转换,其对象并非孤立的语词,而是一个具有高度内在关联性的思想系统。对于哲学翻译而言,翻译的可能性并非来源于语言形式的相似,而在于译者能够深入原典所赖以生成的思想传统,在充分理解其理论脉络之后,以目的语重新建构其概念体系。为了兑现这种可能性,《金花的秘密》的翻译者们采用了多种策略。

第一,掌握源语的思想文化传统。恰如芭芭拉·布塞斯奇(Barbara Brzezicka)所说,如果译者想要恰当地解释整部著作,他必须求助于原文的哲学传统。^②这一原则在卫礼贤等人的翻译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譬如卫礼贤就在译著中强调:“为了理解接下来的译文,有必要对其方法所依据的

^① 参见 Thomas Cleary, *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 The Classic Chinese Book of Life*, New York: HarperOne, 1991, pp.78—79.

^② 参见 Barbara Brzezicka, *La traduction philosophique : élément de la formation fondamentale ou spécialité réservée aux philosophes*, Colloque: La Traduction Spécialisée: Fondements Et Méthodes, Projet TradSpe, 2012, p.6.

哲学基础再讲几句。”(《金花的秘密》,第81页)可以说,“卫礼贤潜心于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翻译、研究,为他的中国典籍译介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①。

《金花的秘密》的译者“表现出了欧洲人罕见的谦恭。他毫无芥蒂地面对它,不带任何偏见和自负,完全敞开自己的心灵,任它控制和塑造”(《金花的秘密》,第13页)。他们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译著,并非仅凭语言才能,而是因为长期接触中国文化的过程中主动调整自身的理解方式,使欧洲既有的历史预设和理性主义取向暂时退居幕后,全面进入东方思想赖以生成的精神语境。这一过程不仅意味着思想观点的变化,而且意味着译者“人格构成的本质性重组”(《金花的秘密》,第13页)。译者能够突破既有文化经验的限制,以开放的态度理解异质文明,真正理解《太乙金华宗旨》赖以生成的哲学语境,这是翻译得以实现的基础。

因此,普遍论所强调的“翻译可能性”,并非建立在语言差异已经消失的假设之上,而是在承认文化差异的前提下,通过深入理解原典思想传统,发现不同文明之间可以沟通的思想基础。《金花的秘密》的翻译实践说明,哲学翻译首先是一种理解活动,其次才是语言活动;译者唯有进入原典的思想世界,才能在另一种语言中重新组织其概念体系,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哲学对话创造可能。

第二,运用功能对等理论保持文化负载词的意义一致性。如果说对思想传统的整体把握构成了哲学翻译的前提,那么具体落实到实现哲学思想表达的技术层面,则体现为尽量保持文化负载词意义的一致性。“文化负载词(culture-loaded words)是指标志某种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组和习语。这些词汇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活动方式。”^②

在哲学文本中,一个术语的理解误差,往往会使整部著作的思想结构变得面目全非。因此,哲学翻译所追求的对等,并非停留于字词层面的一一对应,而是要努力使目的语读者获得与原语读者相近的思想体验。正如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所强调的,翻译应尽可能使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产生大体相同的接受效果。^③

为了实现跨语言的功能对等,卫礼贤等译者付出了诸多努力。首先是运用多种翻译方法刻画核心文化负载词。对于《太乙金华宗旨》中高度文化负载的哲学概念,若一味意译,就容易消解其原有的文化内涵;若完全音译,则又难以为西方读者所理解。因此,卫礼贤等人综合采用了音译、意译与注释相结合的方法。^④比如,贝恩斯的译本在翻译“性”“命”时既保留了hsing、ming的罗马拼音译法,又分别用英语中意义相近的“Life, fate, eros”和“the essence, or principle of human nature, logos”^⑤与之对应,对核心概念进行多层次呈现,使这些术语既保持中国哲学的文化特征,又有利于进入西方读者的理解视域。其次是与既有哲学译介传统保持一致。哲学翻译并非孤立进行,而是置身于既有学术共同体之中,译者应充分吸收前人成果,避免不必要地另起炉灶,使同一哲学的概念体系保持相对稳定。比如,虽然卫礼贤和贝恩斯认为Sinn和Way更贴近“道”的概念,但他们都保留了1870年维克多·冯·史特劳斯(Victor von Strauss)译著中将“道”音译为“Tao”的做法,将之括注于后。此外,卫礼贤等人还注意与目的语表达习惯保持一致。当既有译法不足以准确传达概念时,他们充分考虑了目的语语言资源和哲学传统,在保持概念内涵的前提下寻找较为恰当的表达,而非拘泥于字

① 张大英《德国来青传教士卫礼贤与中国典籍译介》,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6页。

② 廖七一编著《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232页。

③ 参见黄远鹏《再论奈达翻译理论中的“功能对等”》,载《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第101—10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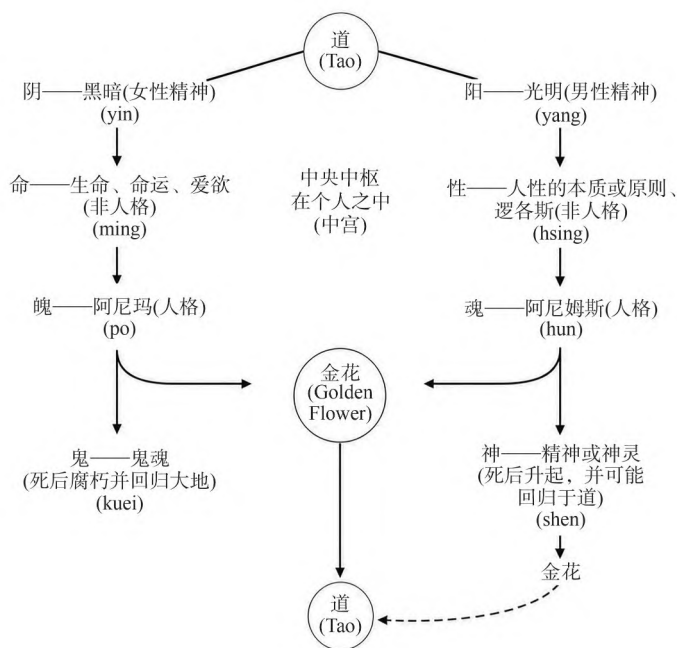
④ 参见郑德虎《中国文化走出去与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载《上海翻译》2016年第2期,第54页。

⑤ Richard Wilhelm translated and explained, C.G. Jung foreword and commentary, *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 The Book of Consciousness and Life*,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62, p.65.

面对应。卫礼贤、贝恩斯将“魂”“魄”与西方心理学的“阿尼姆斯”(Animus)、“阿尼玛”(Anima)相对应,正是这种翻译策略的体现。

不过,这一译法也正是克利里等批评者眼中卫一贝译本系统在概念结构上受到荣格心理学深刻影响的典型例证。二者之间的张力恰恰揭示了归化策略本身的风险边界。“魂”“魄”在道教内丹传统中本具阴阳、动静的结构性对偶,魂属阳而飘动,魄属阴而沉凝。荣格心理学中的 Animus 与 Anima 同样以阳性、阴性原型的两极对偶为核心,二者在“结构关系”层面确有可资类比之处,这构成了此一译法实现功能对等的依据;然而,一旦译文读者以荣格分析心理学的整套理论预设去理解“魂”“魄”的宗教实践内涵,便极易将道教内丹术化约为心理学范畴,从而遮蔽其修炼工夫论的独特旨趣,这正是克利里等人所指出的症结所在。由此可见,功能对等并非绝对无损的等值转换,而始终存在归化过度、以目的语概念体系僭越源语思想的风险,“魂”“魄”与 Animus、Anima 的对译便是这一风险与可能性并存的典型例证,也提醒译者在追求表达习惯一致性时,需对目的语概念可能带来的理论预设保持自觉与节制。

更重要的是,卫礼贤等人并非孤立处理这些文化负载词,而是积极理解并构建起概念之间的关联网路(参见下图)。在这一网络中,“道”作为最高范畴,贯通“性”“命”“魂”“魄”“神”等概念,人可以通过“金花”的修炼工夫趋近“道”。译文不仅较好地保留了文化负载词本身的意义,更呈现了术语之间的逻辑关系和人的修养路径。对于目的语读者而言,理解这些文化负载词无法全然依赖字词训诂,而是要在整个概念体系中逐步把握其哲学功能。由此,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便超越了词汇对应,而成为思想理解的基石。可以说,《金花的秘密》一方面保留了原文的文化异质性,另一方面又降低了理解门槛,使译文读者能够获得与原文读者较为接近的思想体验,较好地体现了功能对等理论所强调的接受效果一致性。



卫礼贤—贝恩斯《金花的秘密》概念体系示意图^①

^① 参见 Richard Wilhelm translated and explained, C.G. Jung foreword and commentary, *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 The Book of Consciousness and Life*, 1962, p.65.

第三是秉持超越西方本位的翻译态度。哲学翻译既是语言活动,也是思想活动。即便译者已经充分把握原典的思想传统,并努力保持概念体系的一致性,如果仍然固守自身文化的价值尺度,将目的语文化视为理解一切思想的唯一标准,那么跨文化理解仍难免流于单向度的阐释。因此,普遍论所强调的翻译可能性,并不仅仅建立在语言的共同基础之上,更建立在一种超越文化本位的理解态度之上。《金花的秘密》能够成为中西思想交流的重要文本,与卫礼贤等人始终坚持的开放立场密不可分。

卫礼贤素因这种开放包容的文化态度获得中西学界的普遍赞誉,被认为天然具有超越种族与民族狭隘性、进入全人类精神层面的禀赋。正是这种生机盎然的思想品格,使横亘于他与异质文明之间的隔阂得以消弭。^①卫礼贤、贝恩斯在译介《金花的秘密》的过程中,始终将中国思想视为一种值得平等对话的精神传统,而非等待西方加以解释和改造的研究对象。他们“坚决反对‘虔信主义’的传教方法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宗教扩张行为”^②,强调译者并非文明优越性的代言人,而是不同思想传统之间的沟通者。不同文明虽然形态各异,但都关切人类精神生活中的根本问题,而翻译正是消除隔阂、实现思想沟通的重要途径。因此,《金花的秘密》并未刻意以西方宗教或哲学范畴消解中国思想的独特性,而是尽可能保存其原有精神,使西方读者能够在理解差异的基础上接近东方哲学。在这种意义上,《金花的秘密》的价值不只在向西方介绍了一本中国道教经典,更在于努力突破近代以来东西方之间长期存在的文化中心主义,使中国哲学能够作为一种独立思想资源进入西方世界的知识视野。

普遍论并不否认语言和文化之间存在差异,而是强调差异之中仍然存在理解与沟通的可能。《金花的秘密》的翻译实践表明,哲学翻译之所以能够跨越文明边界,并不在于找到绝对等值的词语,而在于译者通过深入把握原典传统、重构概念体系并秉持开放的文化态度,使异质思想获得进入另一种语言世界的机会。卫礼贤、贝恩斯等人的努力未必尽善尽美,但真实展现了哲学翻译在“保持差异”与“追求会通”之间不断寻求平衡的过程,也使《金花的秘密》成为中西哲学对话的重要文本。

结 语

哲学翻译从来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而是不同思想传统之间持续不断的理解、解释与重构。“翻译和哲学将目光投向彼此并不是历史的偶然,哲学与翻译从诞生之初就因语言而密不可分。”^③哲学概念的跨语言转化,有利于丰富理解和阐释;而翻译也正是在哲学概念的不断转换中,获得了超越语言层面的思想意义。借助当代语言哲学框架,以单子论与普遍论为两条分析路径,有助于重新审视卫礼贤、贝恩斯《金花的秘密》的翻译实践。一方面,哲学翻译不可避免地受到语言、文化和世界观差异的制约;另一方面,翻译并非不可能,其实质是在深入理解思想传统、保持概念体系功能一致以及超越文化本位的过程中,不断建立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机制。正是在这种不可通约与可以理解的张力之中,《金花的秘密》成为中西思想交流史上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经典译作。

① 参见[德]W.F.奥托著,蒋锐译《卫礼贤——人格肖像》,载孙立新、蒋锐主编《东西方之间:中外学者论卫礼贤》,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页。

② 孙立新、蒋锐主编《东西方之间:中外学者论卫礼贤》,序第5页。

③ 顾晓燕《当代法国哲学思想对翻译学的贡献》,南京大学2020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页。

对于今天的哲学翻译而言,《金花的秘密》仍然具有重要启示。“当代中国的西方哲学翻译仍然以‘信’(直译)作为翻译无可动摇的原则,与此不同,西方汉学家强调翻译的创造性及其意义。”^①事实上,哲学翻译既不能满足于僵化的语词对应,也不能任意创造新的意义,而应在忠实于原典思想结构的基础上,通过创造性的概念重构实现真正的跨文化理解,在差异之中不断开辟新的思想对话空间。

更为重要的是,《金花的秘密》的译介实践所追求的,并不仅仅是某一部中国典籍在西方世界的传播,而是借助翻译重新发现不同文明共同面对的人类精神问题。从更广阔的文化史视角来看,卫礼贤等人的翻译工作不仅关乎个人的学术兴趣,更是近代西方思想界反思自身文明的缩影。他们的翻译与研究,是西方“知识分子为了拯救自身文明与民族国家的命运所做努力的一部分”^②。正如荣格所指出的,强调东西方心灵状态与象征之间的一致性至关重要,因为借助这些类比,方能开辟出一条通往东方精神内在空间的道路;“它是一切文明人所共有的承受、探求和努力的氛围,是自然加诸人类的关于觉醒的巨大实验,它将差异巨大的文化结合成一项共同的任务”。(参见《金花的秘密》,第62页)这种共同任务,正是《金花的秘密》跨越文化边界、持续引发关注的重要原因。

责任编辑:李尚信

Abstract: *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 i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modern Western translations of a Chinese philosophical text and represents a classic case in the history of intellectu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 involves not merely the conversion of linguistic forms, but also the understanding, hermeneutics, and reconstruction of different systems of though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monadism and universalism of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he translational practice surrounding *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 can be reconsidered, thereby allowing for a deeper clarification of the inherent difficulties of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 and the possible ways of addressing them. Monadism reveals the differences in worldviews and modes of thought underlying different languages, placing the culture-specific terms, philosophical concepts, and purposes of translation in a state of persistent incommensurable tension. Universalism, by contrast, demonstrates that intellectu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remains possible. Its realization depends on the translator's thorough engagement with the intellectual tradition underlying the source text, the preservation of functional equivalence for culture-specific term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nceptual systems through an open and inclusive attitude that transcends cultural particularism. The translational practice surrounding *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 demonstrates that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 is not a mechanical pursuit of correspondence between lexical meanings. Rather, it is a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structures of thought and philosophical functions grounded in respect for cultural differences. As such, it offers an illuminating example for bringing Chinese philosophy into global intellectual discourse and facilitating philosophical dialogue across civilizations.

Key words: *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 Richard Wilhelm; Cary F. Baynes;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 monadism; universalism

① 刘毅青《作为哲学创造的哲学翻译:以西方汉学为借镜》,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189页。

② 李新烽、白乐主编《译路帆远:汉学家谈翻译下》,第97页。